

平 北

中德學會工作年報

七 民
國 廿
八 年
月

會址：北平地安門裡黃化門內西姐姐房二十號
電話：東局三八五〇

北平

中德學會工作年報

七 民國廿八年
月 年

53726

內 容

(一) 一般會務

(二) 會員

(三) 各組工作報告

1. 總務組

2. 編譯組

5. 圖書組

(一) 一般會務

本工作年報所包括之時間，係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度內，對於會務除與在平各會員不時會商外，復正式舉行大會兩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之編譯會議

編譯委員會對於準備中及已在印刷中之中德文化叢書文化特刊各項稿件，予以討論。又議決關於國內各校德文班選適當之教材。第三項將久擬出版之本會定期刊物事項列入議事日程。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一日之第五屆年會

首由德國常務幹事代理報告近年以來會中工作情形；報告畢，討論一切，首先商談關於本會所擬新出版之雜誌應如何辦法，並予以決定。本會舉行畢，各委員咸集什刹海會賢堂飯莊晚餐，凡本會會員與其他工作同仁，及中文版『研究與進步』担任撰述同仁，以及德國佛蘭克府中國學院名譽會長魯雅文博士，均經邀請齊集一堂，由楊丙辰教授代表本會對德國大使館代表北平辦事處處長諾爾德博士，及魯雅文博士致簡單歡迎詞。

會址

前期年報曾經叙及本會舊址因一九三五年所遷入之房屋，極感不敷應用，於一九三八年六月遷移較為宏敞新址，新居仍在北城，與舊址相去不遠，比較靠近於平市中心點，距輔仁大學，中法大學，前北京大學，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均不甚遠，而且方便。會址房屋共計五院，全院計房九間，分配如下：

(一) 第一院北房（爲接待室，展覽品蓄藏室，一部份圖書陳列室兼助理員辦公室）



(二) 西房 (佐理員之住室寢室及浴室)

(三) 東房 (圖書室)

(四) 過廳 (辦公室，兼雜誌陳列室，蓄藏室，廚房)

(五) 第二院西廂房 (辦公室)

(六) 第二院東廂房 (小教室)

(七) 南房 (大教室，門房，工友臥房，工友廚房)

(八) 花園前院住室，寢室，浴室各一間以備賓客暫時宿歇之用。

(九) 花園後院 (蓄藏室)。第八九號房屋均係在第四第五兩院內，而四五兩院則為花園所在地。

上述各房屋，非但足敷本會應用，而其外表亦頗壯觀。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新址方修葺完畢，本會始得開始正式工作，而將各部分為社會公開，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所舉行之新址開幕典禮，會東請留平會員及來賓並德國士紳參加。是日天氣雖云欠佳，而中德來賓到者達五十餘人之多。首由本會秘書傅吾康博士代表本會常務總幹事謝禮士博士，行開幕禮並對來賓致詞如下：

「鄙人今日代表敝會常務總幹事謝禮士博士，對蒞會諸位先生與諸位女士敬致熱誠歡迎，今日諸君到會人數之衆，足徵諸君對本會及其工作甚為關切，鄙人無任感謝。茲於請德大使館代表行新址開幕典禮以前，謹先略述中德學會史之梗概，以資紀念。

本會創立於七年前，提倡自鄒壽麟先生，復由德大使陶德曼博士 (Dr. O.P. Taubmann) 與大館使參贊飛爾爾 (F. Schier) 予以協助，同時並由中德雙方友好諸君，首在國立北平圖書館一小室內，開始成立。惜為時甚暫，鄒壽麟先生即已離平，乃由衛德明博士代理會務，更由楊丙辰教授熱烈襄助，故本會歷時不久，乃有今日之成果。

謝博士直至民念四年，始任本會常務總幹事，從茲本會得有較大基礎之建設，惜其今日未能蒞會參加，殊爲遺憾。謝博士承中國有數的學者品學兼優且精通德國文化之馮至先生從旁輔佐摩劃一切，獲益匪淺。本會工作，遂日臻發展，致前會址不敷應用，嗣經謝博士竭力尋覓，方得此適宜而且美觀之會址。

我輩希望本會今後得成爲精神生活上中德文化發軔之中心。

鄙人對於中德學會雙方朋友及本會同仁等，實深感謝，同時仍請諸君，將來對本會前途，不吝益加補助與指導，則不勝幸甚。」

致詞畢繼由德公使館參贊畢德博士代表德大使致詞如下：

「在我們祖國，一切的事情，不論是政治或文化，都是自國家一方面出發的，所以德國的東方之研究，尤其是德國的漢學研究，是與國家有密切關係的。譬如說柏林國家圖書館漢文部分之起源，原是創立普魯士國威而有選舉皇帝之權，遠在十六世紀之大公爵之所創設，關於此點，是世人很少有知道的。後此在最寬廣意義之下先呼醒了德國一般人士們，後又呼醒了德國科學界對於東方之興趣，更使這種興趣時常活躍不息，因此以創立了對東方科學研究之基礎的，却總還是普魯士國遣派到東方來的使館人員所作的那些關於東方情況可爲模範的種種報告，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之全部歷程，尤爲特別顯著。如果在此點上要舉個例子出來的話那麼我就只用一八一六一年普魯士國遣赴遠東，甚至尚有頗有地位的藝術家爲之隨行的使節團所出版那一部含有多冊，而同時包括了關於中日暹羅等國狀況敘述的巨著，當時在德國所呼醒各方面反響底宏擴廣遠，也就足見一斑了。封，布蘭德 (von Brandt) 公使，這是一個關於遠東問題很有成效的著作家，再就是瓦德西東征團以及山東膠州德國提督衙門內之各官方人員，此外還有許多其他人員們，繼起於其後，因爲這些人員們俱係身履東方，對於遠東情形均得親聞親見，所以皆有所著述了。

像這些被德國國家遣派到東方來的官員們，他們甚至於事後，在現代時間裡，仍還在中國居住過的，他們對於中國

和中國文化，都有一種差不多可以說是科學的，遠超他們官方所應盡報告義務範圍之上的興趣。許多從前服務於國家方面的人員們，後來又都退職，專門去作學術研究了，並且在德國在漢學研究方面，國家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多様密切，這是可以由現在中德學會秘書傅吾康博士父尊之先例，便可以証明了，因為他本為中國領事，竟去職，而專心研究科學工作，一至於完成了他那直到獲得普魯士學術研究院會員地位的偉大歷程，不過這普魯士學術研究院，却又是普魯士國家的一種建設。

在這種向來為國家所提倡的巨大傳統之下，便是更向前的一種舉動了，當在現在駐華大使陶德曼博士創立這個中德學會時，這個中德學會並不僅是在吸收的方面，把對於中國的智識和研究，灌輸到德國去，乃是倒轉過來，要創造一個機關，也要把我們德國最好的價值，輸入到中國來，在上次中德學會開年會時，陶德曼博士曾表出他的志願，使中國、本國到處都有這種中德學會的設立。雖然這一種可慶幸的發展，因眼前事變，有所阻礙，但是北平這個中德學會，現在向進一步的進展，却是達到了。諸位今天在此處所看見的優美形式，便是一個特徵，證明立於這個學術機關之後的，德國國家的這個傳統，是永久性質的，是要超出一個人的一生，和工作時期之上而繼續不已的追求這些目的的。

我甚喜歡，今天能得代表現在離平的德國大使陶德曼博士，把這個彷彿由火灰中又復生了出來的中德學會，在牠工作的，新的，優美的更適和目的的方式之下，交付於中德人士們之應用，並且我再說一句伴隨一切大學工作的話，作為我這篇講演的結尾，並藉以祝諸君之安康。這句話就是：Felix faustaque sit（願成功之作與天才之作恆存世間，並為世人之所重視！）

福吾康博士及畢德博士講演詞均由本會德文班教授董遂曾先譯述講述完畢，繼由楊丙辰教授代表中國會員及學會同仁方面致詞如下：

「使館參贊先生，諸位女士與諸位先生！

我們素來都是抱着一種意見的，以為再沒有較比各民族在文化領域上為作和平的競爭與共同工作彼此互相攜手，互相幫助的情形，還要更加優美高尚，更加值得努力謀求的了。

這，像剛繼傳吾康博士之所提出的一般，却會是作了主要宗旨的，當在那時山中德兩方吐露出來，要在北京建立中德學會的志願時；對於福吾康博士所說的話，我只還要再增加一句上去的，就是中德學會自從創立以來，一直到如今，都是忠於這個目標，而時時刻刻把這個目標放在了眼裡的。今天借着舉行中德學會新會址為社會上一般人士開放的慶祝典禮的機會，我要在諸位來賓之前，特別提示，中德學會雖因時局所發生的種種困難，不但工作未曾停止，反而時時都在增加，都在向前進行；因為這新會址，這是我們眼前都能瞧得見的較比舊會址已經是擴大得多了而因這種擴大擴展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尤其應當感謝的，自然便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博士其次便是使館參贊畢德博士再其次就是現在不在北京的本會常務總幹事謝禮士博士和許多其他中德兩國人士們，他們都會直接或間接與學會以贊助的。我以中國會員方面的代表，特以至誠的銘感，在這兒提出這一些先生的名姓，我深以為遺憾的，就是我的同胞中有許多充當本會會員的，因現在政治的關係未能到會參加慶祝典禮。因為我們中國人士方面，也確切知道，中德學會在中國之建立，是多樣一種萬幸的，優美的，和實實在在重要的事業的，並且我多喜歡，多深深覺感謝，當在我方纔聽見了使館參贊畢德博士所作那些啓示時，就是關於德國人士們，尤其關於德國居於領袖地位的偉大人物們自多樣長久時期以來，並用多樣大的對中國的敬重與對中國的研究所懷的興趣的啓示。從中國方面，我們固然不能作出這樣的報訴來，但是我以說，我們對於德國人的同情，我們對於德國文化和科學的興趣，因為德國的文化與科學，為我們祖國的新建設是這樣重要和不可缺少的，所以也決不較比德國方面有所減輕的。德大使陶德曼先生的志願，要到處在中國建設這樣的中德學會，也完全是我們的志願的，我極其希望這種志願能以滿償。並且為這個緣故，我們對北平中德學會今天所開的慶祝典禮，就只希望他前途發達茂盛，和日見進步，並且還希望他完全照着直至今日的樣子：以牠的工作，把中德兩國的人民，也在

其他的領域上，譬如說，在政治，在經濟，在技術，在科學，在商業等等領域上，愈久愈密切的聯合了起來，愈久愈鞏固的結合了起來。」

最後北平國社黨地方組指導員郝普思(Walser)先生致詞，由楊丙辰教授譯述如下：

「在諸位演說之後，我只還要再簡略提出一個問題來，向大家說一說，這問題雖未經方纔諸位的演說之所提出，但却值得人們的一點注意的。中德學會一直到如今在社會上並未特別到了顯著地步，這個原因，當是與中德學會所樹立的目標有關的了，這種目標，為中德學會的建設與擴大，首先之所要求的，便是一種處在安靜中的工作，而其次，為工作的開始自然是只能包括一部分有限的，中國的會員與愛好的人士們了。再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在城北部的舊會址，我在這句話上，尤其之所想到的是住在北京的德國同胞們的，為加緊的利用這個應當利用的學會，是不甚適宜的。因此中德學會現在遷移到了這所美麗安靜的房舍之內來，我便要視之為一種頗具有吸引能力的舉動了，並且希望，這個學會既在會址方面與大家謀求了便利，迎合了大家的意思，那麼諸君也容易尋到入這學會裏來的道路了。金魚胡同德國俱樂部取消後，我常聽到人們表示遺憾的言詞，那麼我相信，現在這中德學會是給予諸君一個很好的代償所了。我希望諸君在這兒，可以消磨許多閒暇光陰，因為這兒除了一大列雜誌之外，還有豐富的圖書，可以隨時供諸君閱覽之用，諸君對這學會所給予的關切興趣，不但能助長學會中共同工作者的工作興趣，並且還能超出這一點之上去，共同協助着達到學會所樹立的目標，就是同中華民族作一種更加密切的共同工作的目標。」

此外我在我說的這話底末尾，還要結合上我的一個希望，就是希望我們德國人們現在所僑居而受着重重大考驗的這友邦裡的情況，馬上就可好轉，而這樣也可能得使中德學會愈加自由發展，愈加有補於中德兩國之民族。」

開幕 禮正式舉行畢，各來賓參觀新屋後，齊集大廳略進茶點，即告散會。

(二)會員

本年度年報有新增會員如下：

董事

項子蘇先生

天津中國留德學生會

總務委員會

顧克司博士

北平輔仁大學教授

蘇秉琦先生

昆明北平研究院

董遂曾先生

本會德文補習學校教師

魏福仙博士

北平德國學校校長

吳豐培先生

北平輔仁大學講師

編譯委員會

張東蓀先生

北平燕京大學教授

方志滂先生

北平華僑學志編輯員

薩本鐵博士

北平輔仁大學教授

王錦第先生

北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

中德學會工作年報

圖書委員

顧華先生

北平圖書館閱覽組組長

常務幹事

本會常務幹事哲學博士謝禮士先生與哲學博士馮至先生在本年會內均行告假，會務由哲學博士傅吾康先生代理。本會中文秘書張天麟先生獲假一年赴德國研究，其職務由王熙庸先生代理至一九三九年五月為止。至本會所附設補習學校之教員一職，則由董遂會先生担任。

(三) 各組工作報告

1. 總務組

關於研究及留學諮詢事項在本年度中國情況之下，尤以中國錢幣價格有跌無已，致能以私資赴德留學之中國學者及學生，遂大見減少；但仍有一部份赴德留學者，關於赴德研究區域學校，及生活費用等概由本組代為計議，並向與本會素有聯絡之學術團體及主管機關介紹，此外尚代為翻譯證明書或直接由本會給與德文證明書。再凡有以德國各區域公共生活情形，尤以關於學校事務與課程制度等來諮詢者，本組無不以有利益方面竭誠奉答，本組在德國方面最有聯絡之學術機關，則為德國明興德意志研究院 (Deutsche Akademie München)

贈閱刊物：往歲本組受柏林德國學術交換所之囑，按時將「時代精神」雜誌，「簡報」，多種醫學刊物，以及其他專門刊物贈與中國讀者，本年度仍按期寄出。醫學刊物，係德國來比錫城題默書局 (A. Thieme, Leipzig) 以友誼關係，贈

予本會者。

公開聯絡：爲使本會與北平各大學教授及其他學者之間，得以密切聯絡與增進感情起見，本會特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假座福泰館，舉行午宴，被邀者有輔仁大學校長，燕京大學校長，及各分科院長，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國立北平圖書館行政委員會會員與多數輔仁燕京中法各大學教授，以及留平本會會員等，總計約在五十人以上。本會編譯委員會員楊丙辰先生代表本會，向來賓致詞，并陳述本會之性質，工作及目的之所在。

更進而圖與北平各中學接近起見，特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本會略備便餐，宴請多數中學校長蒞臨參觀本會會舍及各項設備，席間由本會編譯會會員王錦第先生代表本會，簡單致詞，并陳述本會之任務及宗旨，席間市立第一中校長楊蔭慶先生代表來賓致答詞，并略述德國科學之價值與意義，足爲中國建設教育之借鏡云云。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在本會會客廳，舉行德國漢學家談話，是日除德國弗蘭克府中國學院名譽會長魯雅文博士爲名譽來賓外，尚有與本會有友誼關係之多數中國及外國漢學家均在被邀之列。

訪問人數及通訊：來會諮詢及閱書報者本年度共計九七三人（參與本會臨時特別會聚者除外）
本會本年度所收信件如下：

德文信件	二八二封
英文信件	二七封
中文信件	一三七封
名信片	七四片
印刷品（書籍雜誌除外）	七五件
本會發出文件：	

申德學會工作年報

中德學會工作年報

德文信件	三五八封
英文信件	三二封
中文信件	二七八封
名信片	五六片
印刷品	二二二四件
雜誌	一六三六本

獎學金：本年度與往年相同，仍發給北平各大學德文優良學生以獎學金額，欲得此項獎學金者，須經一度試驗，所試驗者係德文譯漢文一篇，德文簡短作文一篇。

得獎學金者如下：

每名獎華幣一百五十元者計：

- 藍鐵年 輔仁大學哲學系學生
- 程京 燕京大學物理學研究院學生
- 崔亮 燕京大學經濟系學生
- 伊去病 輔仁大學數學系學生

獎華幣一百元者計：

- 殷增芳 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及經濟系學生

獎華幣五十元者計：

- 周志仁 北京大學醫學院學生

得獎金各生，須時常以研究所得，用德文書面，報告本會。

德文書冊獎品：一九三八年夏季，本會收到駐華德國大使館北平辦事處交來多數德文書籍，分贈北平各中學校與各大學對德語有優良成績之學生，作為獎品。此種書籍，即由本會交由有德文之各大學校德語主任與本會補習學校教師，分別轉贈各學生，此外尚有書籍由個人代表本會轉贈各學子者。

德文補習學校：德文夜班，在本年度更見擴充，事變時多數各大學，均無形關閉或遷移他方，致德文課程，至少亦均改為選科，但事變後，其新設各大學，對德文一門雖未完全廢除，然其鐘點確已減少。故本年度除各大學外有特別需要之處，本年度本會成立德文補習班，共計四班計一年級兩班，二年級一班，三年級一班。每級每週授課二次：每次一小時半，每晚即在本會兩教室，分別講授。初級班由董遂曾先生講授，高級班由本會佐理福吾康博士講授。課程管理，則由輔仁大學德文教授艾克博士主之。學年開始時，來會報名者達八十六人，計初級四十六人，二年級三十人，三年級十人。

參觀德國商店：一九三八年冬季，有北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銀行專科教員與學校校長率領該校學生參觀德華銀行北平分行及禮和洋行，由該行等總經理領導參觀，並說明其營業工作與商業簿記等方法，以及其他。

學生茶話會：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與六月二十四日下午輔仁大學教授艾克博士在本會大廳，舉行茶話會約請輔仁德文班同學，藉資聯歡，更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同樣舉行本會補習班二三年級同學茶話會。

2. 編譯組

本年度本會叢書，由商務印書館承印出版者有下列兩種：

- 一，中德文化叢書之七：里爾克著，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 一，中德文化叢書之八：黎耳著，論德國民族性

中德學會工作年報

一一三

一九三九年三月秒在印刷中者如下：

- 一，中德文化叢書之九：斯托姆著，斯托姆小說集。
- 一，中德文化叢書之十：史梯夫著，德國史略。
- 一，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一：尼采著，快樂的知識。
- 一，中德文化叢書之十二：魏特著，湯若望傳。

* 該兩種叢書本年九月間出版

同時，審核已畢準備付印者有下列二種：

一，菲希特：忠告德意志民族

一，葛德：論自著之浮士德

準備譯述者：

一，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一，葛德：親和力

一，海內曼：德國文學史

一，豪夫曼：金罈

一，士榜歌：文化哲學論文

本會出版叢書，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止，售出情形，簡報如下：

(括弧內數目為售出之總數)

中德文化叢書之一：魏蘭之介紹

中德文化叢書之二：陰謀與愛情

售出五〇（一六九五）

中德文化叢書之三：工作學校要義

售出五五（一四九九）

中德文化叢書之四：德國史綱

售出二三三（二二七九）

中德文化叢書之五：女青年心理

售出九八（一〇六八）

中德文化叢書之六：五十年來之德國學術

售出四七九（一一六一）

第一冊五四二（一一八八）

第二冊三八〇（三八〇）

第三冊二一四（二一四）

第四冊二一四（二一四）

第七集：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售出四〇〇（四〇〇）

總計售出二六六五（一〇〇九八）

中德文化特刊：於一九三七年曾出版赴德留學指導書，本年度，亦出華文譯本兩種：

中德學會工作報告

第二卷：維連模哥拉飛著：今日之德國教育

第三卷：德國內政部長弗利克博士著：統一國家之德國

在準備中之譯件，則有在德國之「中國學」與華文雜誌所出對德國論文之目錄，或自德文雜誌譯成華文之散文論文。

德文教科書：本會鑒於德文班，德文教材缺乏，急待彌補，乃決定入手編著適宜之德語教材。現已準備付印者，有德華常用小字彙，本書包括日常應用之字（約三千字），專備為初學德文者應用。現在準備者，尚有德語教科書，各課德文簡單文字，均附以華文註釋，為第一二年級應用。

雜誌：自中日事變開始以來，除被佔區內出版之雜誌已停刊外，只少數刊物，尚可刊行，本會中國會員及同人等，擬彌補此缺憾，遂於一九三九年刊行第一冊雜誌，華文名稱為『研究與進進』，德文名稱為『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刊行本雜誌乃係與德國科學情報處長克和夫博士及柏林研究與進步雜誌社出版部徵得密切聯絡，始行出版，願其所示之名稱，其意不言自明。現每季出版一次，其重要內容，為德國人文及自然科學界各方面最新之研究與其結果之短篇論文，由中國相當專門學者譯述之，此外更由中國學者將德國文化及精神生活著為論文，登載該刊，已出版各冊之內容如下：

第一期（一九三九年四月）

導言（本會為本刊敬告讀者）

康特哲學之專門名詞

葡萄牙人初抵中國

佛教救世說之根源

張東蓀著

柴赫林著 張星煊譯

格赫爾著 楊丙辰譯

物理學與世界觀

佛爾克教授與其名著中國哲學史

中國歷史學的要質

關於咖啡及咖啡精之管見

阿克發彩色照像新法

高頻率振動及起聲

研究膠質之新工具——電子顯微鏡

第二期（一九三九年七月）

現下在德國之中國學

論吐火羅語存在之真實性

文化形態學的問題

古代中國的天文學

百年前德意志的學術和國家

貨幣在經濟地位中的地位

白喉傳染經過及其預防

司麥卡！瑞曼效應的性質及其化學上的應用

水之異常性質

介紹遠東博士

普蘭克著 王錦第譯

方志滂著

福蘭閣著 朱炳霖譯

史韋廉著 鮑鑑清譯

艾格爾著 陳光熙譯

白格曼著 高嬰齊譯

白席耳著 程 京譯

福蘭閣著 楊丙辰譯

西 穎著 王靜如譯

士榜歌著 王錦第譯

愛伯華著 方志滂譯

梅安敖著 胡雋吟譯

韋凱曼著 陳國慶譯

薄非禮著 鮑鑑清譯

西門安圖著 高嬰齊譯

達 曼著 朱雨苗譯

卜榮天著

中德學會工作報告

3. 圖書組

甲 本會圖書

本會中德圖書，本年度內，更加擴充，計由購置，贈送及交換所得者三百六十種，共四百五十九本；與前所有者合計二千二百三十六種，總計三千五百六十七本。

此外本年度本會圖書館，按期收到德文報章，雜誌等共五十一種。

本年收到贈書總計：

北平衛禮賢太太

一百三十五本

柏林德國國外書籍交換所

一百二十九本

其他捐贈者

六十二本

總計三百二十六本

茲本會於此特向捐贈者致謝，並望此後對本會圖書館之擴充，仍予以襄助。

圖書館關於中國部分者，專搜集已出各種由德文譯成中文之書籍與特刊以及完全或一部分有關德國文化之著作。

本館現存是項書籍計五八一本，又雜誌三五五冊，此種雜誌多半包含上列意義之下之尊貴材料。

本年度本組業將德文圖書著者目錄編就圖書提要目錄業於上年完成，關於華文圖書提要目錄，業已編集藏事。著者與譯者目錄亦在準備中。

乙 公開展覽事項

展覽會

本會於十月一日至十日，在北平中央公園，舉行德國古今木刻展覽，所搜集之總數，約有二千幅，陳列分爲三部份，一部份最大，爲自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德國古木刻家之木刻畫，概係國家印刷局翻印者，第二部份爲德國今日健在藝術家之原版畫，其中一部份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冬季曾在天津公開展覽一項；第三部份爲德國尚健在藝術家應用木刻畫，表示此種藝術木刻，用於各種插畫及圖案，極爲適宜，概係柏林製版藝術自由聯合會，特爲本會搜集選拔而來者。本會爲參觀者便於閱覽計，將搜集各畫編成目錄附以德國木刻藝術發達史之記述。

開會日雖云天氣欠佳，而觀衆竟逾五千人，本會尙擬將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三七年在平津已舉行之複印五百年來德國彩色圖畫之物品連同木刻畫等，在中國他處亦行展覽，惟因時局不靖，不易舉辦，想必有恢復安靖之地點，屆時再行舉辦。

影片映演：於一九三八年秋季，本會介紹德國文化及風景影片五種，曾東請本市各大學及中學學生與教授等蒞臨觀覽，在北平映演凡三次，天津映演一次。北平映演凡三次，天津映演一次。北平映演時，每次皆由本會會員楊丙辰教授作簡單說明，在津映演時，則由本會會員王錦第先生略致說詞，參觀人衆，約二千六百人。

本會因與拜耳藥廠有特殊友誼關係，於一九三九年四月由該廠借到柏林世界運動大會之小型有聲影片，在平津映放多次，各大學及中學學生來觀賞之人數，約三千六百人。

講演：上海德國威廉中學校校長 (Gruel) 顧格爾先生曾於四月十一日在本會，用德語講演「德國現今教育之目的」，是日請有本會會員及通曉德語者蒞會聽講，講演時極博得聽衆贊許及興趣，同日由少數會員陪同晚餐，於席間賓主隨意暢談德國教育及其特質各問題，盡歡而散。

本年度值茲和平及秩序尙未恢復，而戰亂頻仍，雖處此種困難障礙情形之下，但本會主張及工作，不受阻梗，仍本已往宗旨促進中德間文化之關係，並使兩國間之學術與文化，日臻進步。

中德學會工作報告

一八

最後本會對於會員及諸友好直至今日扶助本會工作竭盡之熱誠，再致謝忱於此，并希對將來本會之工作，繼續維持，且永保友誼關係。

代理 中國
德國 常務幹事 哲學博士 傅吾康 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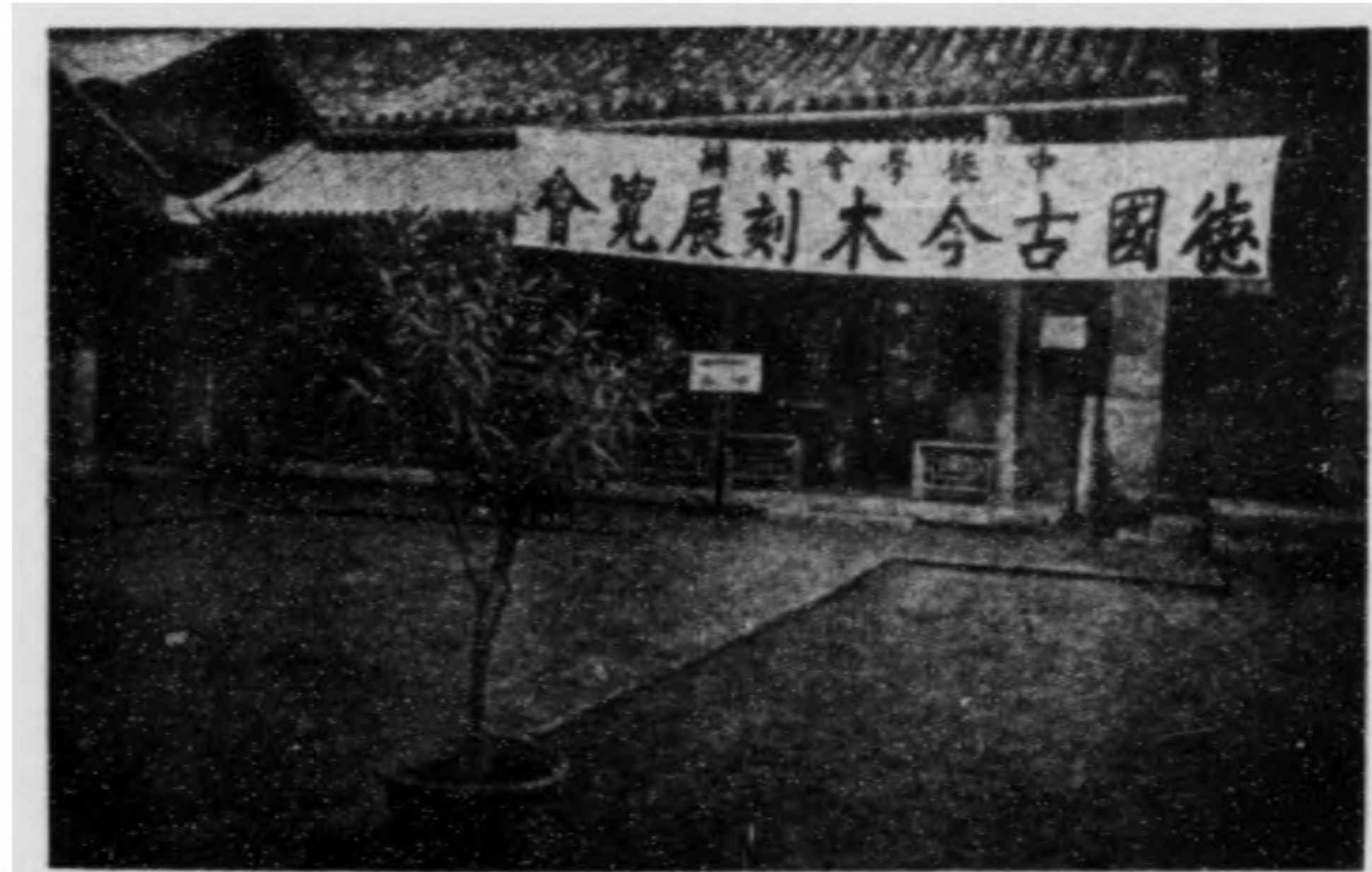
Empfangshalle 客廳



Bibliothek 圖書館



Bei der Eröffnungsfeier des neuen Hauses
新址開幕典禮



Eingang zur Holzschnittaussstellung
木刻展覽會會場之正門

Arbeit notwendigen friedlichen und geordneten Verhältnisse gebracht hat, sondern Krieg und Unruhe weiter fort dauerten, so ist doch diesen Schwierigkeiten und Hemmnissen zum Trotz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beharrlich und unbeirrt seiner Arbeit nachgegangen und dazu entschlossen, diese auch in Zukunft im alten Sinne fortzuführen zur Förderung der chinesisch-deutschen Kulturbeziehungen und zum Nutzen von Wissenschaft und Bildung in beiden Ländern. Mit dem Danke für alle bisher geleistete Hilfe und Unterstützung verbinden wir auch dieses Mal wieder die Bitte, daß unsere Mitglieder und Freunde dem Deutschland-Institut weiterhin ihre Mitarbeit und Freundschaft erhalten mögen.

Peiping, Ende Juli 1959

In Vertretung des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Geschäftsführers
Dr. phil. Wolfgang Franke

alle Art verwandt werden können.—Die Sammlung in ihrer Gesamtheit wurde von der Freien Vereinigung der Graphiker in Berlin ausgewählt und dem Deutschland-Institut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Zum besseren Verständnis der Ausstellung hatte das Institut einen Katalog der Sammlung mit einer Einführung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Holzschnittkunst zusammengestellt.

Trotz unfreundlichen Wetters zählte die Ausstellung über 5000 Besucher. Es ist die Absicht des Institutes die in den Jahren 1936 und 1937 in Peiping und Tientsin gezeigte Ausstellung „Deutsche Malerei aus fünf Jahrhunderten in farbigen Wiedergaben“ sowie die Holzschnitt-Ausstellung auch in anderen Plätzen Chinas zu zeigen. Infolge der unruhigen Zeiten muß dies jedoch auf einen Termin, wo wieder geordnete Verhältnisse herrschen, hinausgeschoben werden.

Filmvorführung: 1. Im Herbst 1938 lud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Studenten und Professoren einer Reihe von Hoch- und Mittelschulen zu einer Vorführung von fünf deutschen Kultur- und Landschaftsfilmen ein. Die Filme wurden dreimal in Peiping gezeigt und einmal in Tientsin; jeder Vorführung in Peiping ging ein kurzer Vortrag unseres Mitgliedes Prof. Yang Ping-chen voraus. Bei der Vorstellung in Tientsin sprach unser Mitglied Herr Wang Kin-ti einige einleitende Worte. Insgesamt wurden die Aufführungen von etwa 2600 Personen besucht. 2. Durch besondere Freundlichkeit der Firma Bayer-Pharma Co. hatte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im April 1939 die Möglichkeit, den von dieser Gesellschaft hergestellten Schmal-Tonfilm von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in Berlin vor Studenten und Schülern der verschiedenen Hoch- und Mittelschulen Peipings und Tientsins in mehreren Aufführungen zu zeigen, die zusammen von über 3600 Personen besucht wurden.

Vorträge: Herr Studiendirektor Gugel von der Kaiser-Wilhelm-Schule in Shanghai hatte die Freundlichkeit, am 11. April im Deutschland-Institut in deutscher Sprache einen Vortrag über „Das Ziel der deutschen Erziehung“ zu halten. Das Institut hatte hierzu seine Mitglieder und deutschsprechenden Freunde eingeladen. Der Vortrag wurde mit Beifall und Interesse aufgenommen. Bei einem am gleichen Tage folgenden Abendessen mit einigen Mitgliedern des Institutes war Gelegenheit zur weiteren zwanglosen Unterhaltung über Fragen des deutschen Erziehungs- und Unterrichtswesens gegeben.

Wenn auch das letzte Jahr noch nicht die für eine fruchtbringende

360 Werke in 459 Bänden

Damit erhöht sich der gesamte Bestand auf

2236 Werke in 5567 Bänden.

Ferner erhielt die Bibliothek regelmässig 51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An Geschenken gingen während des Berichtsjahres ein:

Frau S. Wilhelm, Peiping	135 Bände
Deutsch-Ausländischer Buchtausch, Berlin	129 „
Verschiedene Stifter	62 „
Summe	<u>326 „</u>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dankt auch an dieser Stelle allen Gebern für ihre Stiftungen und verbindet damit die Bitte, auch für die Zukunft beim Ausbau der Bibliothek weiter mitzuhelfen.

Die Aufgabe der chinesischen Abteilung der Bücherei ist, alle in chinesischer Sprache erschienenen Übersetzungen aus dem Deutschen sowie Werke, die sich ausschließlich oder teilweise mit Deutschland und deutscher Kultur befassen, zu sammeln.

Sie umfaßt zur Zeit 581 Bände; ferner 355 Bände Zeitschriften, die ebenfalls zum Teil wertvolles Material im obigen Sinne enthalten.

Im Laufe des Berichtsjahres wurde der Autorenkatalog der deutschen Büchersammlung fertiggestellt; der Realkatalog war bereits im vorigen Jahre vollendet. Für die chinesische Büchersammlung wurde ein Realkatalog zusammengestellt. Ein Autoren- bzw. Übersetzerkatalog ist in Vorbereitung.

B. Öffentliche Veranstaltungen

Ausstellungen: Vom 1. bis 10. Oktober 1958 veranstaltete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im Peipinger Zentralpark eine Ausstellung „Der deutsche Holzschnit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Die Sammlung umfaßt im ganzen etwa 200 Bilder in drei Abteilungen. Die erste und größte stellen Holzschnitte alter deutscher Meister aus dem 15. bis 19. Jahrhundert dar. Es sind dies Nachdrucke aus dem Verlage der Reichsdruckerei. Die zweite Abteilung bilden Originalwerke lebender deutscher Künstler. Sie wurde schon einmal im Winter 1957/58 in einer Teilausstellung in Peiping und Tientsin gezeigt. Die dritte Abteilung endlich besteht aus angewandten Holzschnitten lebender Meister und soll zeigen, wie künstlerische Holzschnitte praktisch in Illustrationen und Dekorationen

No. 1. (April 1939)

Geleitwort

Kant's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Dschang Dung-sun
Die Ankunft der Portugiesen in China	Eginont Zechlin
Die Wurzeln der buddhistischen Heilslehre	Helmuth v. Glasenapp
Physik und Weltanschauung	Max Planck
Alfred Forke und sein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Achilles Fang
Der Sin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Otto Franke
Einiges über Kaffee und Coffein	Wilhelm Stepp
Über das neue Agfacolor-Verfahren	John Eggert
Hochfrequente Schwingungen und Ultraschall	Ludwig Bergmann
Das Elektronenmikroskop als neues Hilfsmittel der Kolloidforschung	Dietrich Beischer

No. 2. (Juli 1939)

Die Chinakunde in Deutschland	Otto Franke
Und dennoch „Tocharisch“	Emil Sieg
Probleme der Kulturmorphologie	Eduard Spranger
Zur frühchinesischen Astronomie	Wolf Eberhard
Wissenschaft und Nation in Deutschland vor hundert Jahren	Arnold O. Meyer
Das Geld in der Wirtschaftsordnung	Erwin Wiskemann
Infektionswege der Diphtherie und ihre Abwehr	Felix von Bormann
Über das Wesen des Smekal-Raman Effektes (S.R.E.) und seine Anwendung in der Chemie	Arthur Simon
Die abnormen Eigenschaften des Wassers (Gustav Tammann)	Gustav Tammann Wilhelm Brüll

3. BIBLIOTHEKSABTEILUNG

A. Bücherei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Die deutsche und chinesische Büchersammlung wurde weiter ausgebaut. Erstere erwarb im Berichtsjahre durch Kauf, Geschenk oder Tausch weitere

Sonderreihe: In der im Jahre 1937 mit einem „Ratgeber für Chinesen, die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studieren wollen“ begonnenen Sonderreihe erschienen im Laufe des Berichtsjahres zwei chinesische Übersetzungen:

- Bd. 2: Th. Wilhelm and G. Graefe, German Education Today,
 Bd. 3: Reichsinnenminister Dr. Frick, Germany as a Unitary State.

In Vorbereitung befindet sich die Übersetzung eines Aufsatzes über Die Chinakunde in Deutschland, sowie ein Index der in chinesischen Zeitschriften erschienenen Artikel über Deutschland oder Übersetzungen aus dem Deutschen.

Unterrichtsbücher: Um einem dringenden Mangel abzuweichen, hat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beschlossen, die Herausgabe von geeignetem Material für den deutschen Sprachunterricht in Angriff zu nehmen. Im Druck befindet sich bereits ein „Kleines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für den Anfang“, das die gebräuchlichsten deutschen Wörter (etwa 3000) enthält. Es ist in erster Linie für Anfänger im Studium des Deutschen gedacht. In Vorbereitung befinden sich ein Leh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für das erste und zweite Jahr sowie einfache deutsche Textausgaben mit chinesischen Erklärungen.

Zeitschrift: Schon seit längerer Zeit wurde von chinesischen Mitgliedern und Freunden die Herausgabe einer Zeitschrift durch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angeregt. Seit Beginn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haben von ein paar ganz wenigen Ausnahmen abgesehen sämtliche im besetzten Gebiet herausgegebenen Zeitschriften ihr Erscheinen eingestellt, so daß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mit dazu beitragen kann, diese Lücke auszufüllen. Im April 1939 erschien das erste Heft der Zeitschrift mit dem chinesischen Namen „yen giu yü dsin bu“ und dem deutschen Titel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Wie der Name zeigt, geschieht die Herausgabe in enger Verbindung mit Dr. Karl Kerkhof, dem Leiter der Reichszentrale für wissenschaftliche Berichterstattung und Herausgeber der deutschen Zeitschrift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in Berlin. „Yen giu yü dsin bu“ erscheint vierteljährlich und enthält zum überwiegenden Teil kurze Artikel über die neuesten Fortschritte und Resultate aus allen Gebieten der deutschen Geistes-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von entsprechenden chinesischen Fachgelehrten übersetzt, ausserdem Aufsätze chinesischer Gelehrter über Themen aus dem deutschen Kultur- und Geistesleben. Die bisher erschienenen Hefte haben folgenden Inhalt:

Bd. VII : Rilke,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VIII: Riehl, Deutscher Volkscharakter

Im Druck befanden sich Ende Juli 1939

IX : Storm, Novellensammlung¹⁾

X : Stieve, Vom Volksstamm zum Volksstaat²⁾

XI : Nietzsch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XII : A. Vö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An druckfertigen Manuskripten lagen zur gleichen Zeit vor:

Ficht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Goethe über seinen Faust

Die Übersetzungen folgender Werke sind in Vorbereitung

Hebbel, Novellen

Goethe,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Heinemann, Deutsche Dichtung

E.T.A. Hoffmann, Novellen

E. Spranger, Kultur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Die folgende Übersicht zeigt, wieviel Exemplare der Übersetzungsreihe vom 31. Juli 1937 bis 30. April 1939 verkauft wurden. (Die Zahlen in Klammern bedeuten den Gesamtverkauf.)

Bd. 1. Einführung zu Wieland.	50	(1695)	Exemplare
Bd. 2. Schiller, Kabale und Liebe	55	(1499)	„
Bd. 3. Kerschensteiner, Begriff der Arbeitsschule	253	(2279)	„
Bd. 4. Haller,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98	(1068)	„
Bd. 5. Croner, Psyche der weiblichen Jugend	479	(1161)	„
Bd. 6. Aus 50 Jahren deutscher Wissen- schaft	I. 542	(1188)	„
	II. 580	(580)	„
	III. 214	(214)	„
	IV. 214	(214)	„
Bd. 7. Rilke,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400	(400)	„
Summe		2665 (10098)	„

1) Erschienen im September 1939

2) Erschienen im Oktober 1939

Sprachkurse in den verschiedenen Hochschulen und die Abendschule des Institutes zur Verteilung weitergegeben. In einigen Fällen wurden sie von einem Vertreter des Institutes persönlich den Empfängern überreicht.

Abendschule: Die deutschen Sprachkurse wurden im Berichtsjahre weiter ausgebaut. In den zahlreichen Universitäten, die zu Beginn des Konfliktes geschlossen oder verlegt wurden, wurde Deutsch zum mindesten als Wahlfach gelehrt. Da aber in den nach Beginn des Konfliktes neu eröffneten Unterrichtsanstalten die deutsche Sprache wesentlich zurückgedrängt, wenn nicht ganz ausgeschaltet ist, hat sich ein besonderes Bedürfnis nach deutschem Sprachunterricht außerhalb der Hochschulen geltend gemacht. Im Berichtsjahre wurden vier deutsche Sprachkurse abgehalten; zwei Parallelkurse für Anfänger, einer für das zweite und einer für das dritte Jahr. Die Kurse fanden je zweimal wöchentlich eineinhalb Stunden am Abend in den beiden Unterrichtsräumen des Institutes statt. Die Anfänger unterrichtete Herr Tung Sui-tseung, die Fortgeschrittenen der Assistent des Institutes, Dr. Wolfgang Franke; die Unterrichtsleitung lag in den Händen von Herrn Prof. Dr. Ecke, Lektor der Deutschen Akademie und Professor für Deutsch an der Fujen-Universität. Die Zahl der eingeschriebenen Teilnehmer betrug zu Beginn des Schuljahres 86, davon 46 Anfänger, 50 Fortschrittene im zweiten und 10 im dritten Kurs.

Besichtigung deutscher Firmen: Im Winter 1958/59 besichtigten Schüler der Peipinger höheren Handelsschule unter Führung ihres Bank-Fachlehrers und des Schulleiters, der Mitglied des Institutes ist, die Peipinger Filialen der Deutsch-Asiatischen Bank und der Firma Carlowitz & Co. Geschäftsführer und Angestellte der beiden Firmen erklärten den Schülern dabei die Arbeitsweise des Geschäftes, Buchführung usw.

Tee-Nachmittage für Studenten: Am 29. April, 25. und 24. Juni fanden in den Räumen des Institutes Tee-Nachmittage für die Studenten der Deutschkurse des Institutsmitgliedes Dr. Ecke, der Fujen-Universität statt.—In der gleichen Form hatte am 4. März 1959 das Institut die Studenten des zweiten und dritten Kurses der Abendschule eingeladen.

2. ÜBERSETZUNGSABTEILUNG

Schriftenreihe: Im Laufe des Berichtsjahres erschienen zwei weitere Bände der vom Deutschland-Institut herausgegebenen Übersetzungsreihe im Verlag der Commercial Press:

Drucksachen (ohne Bücher-und Zeitschriftensendungen)	75
---------------------------------------------------------	----

Es wurden versandt:

Briefe in deutscher Sprache	558
Briefe in englischer Sprache	52
Briefe in chinesischer Sprache	278
Postkarten	56
Drucksachen	2224
Zeitschriften	1656

Stipendien: Wie schon in früherer Zeit hatte auch im Schuljahre 1958/59 das Institut wieder sechs Prämien für Studenten Peipinger Hochschulen, die besonders gute Kenntnisse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aufwiesen, ausgeschrieben. Die Bewerber mußten sich einer Prüfung unterziehen, in der eine Übersetzung aus dem Deutschen ins Chinesische sowie ein kurzer deutscher Aufsatz verlangt wurde.

Es erhielten

je Ch. §. 150.—Lan T'ie-nien, Student der Philosophie, Fujen-Universität.

Ch'eng Ching, Student der Physik, Yenching-Universität.

Ts'ui Liang, Student der Volkswirtschaft, Yenching-Universität.

I Kü-ping, Student der Mathematik, Fujen-Universität.

Ch. §. 100.—Ying Tseng-fang, Student der Zeitungswissenschaft und Volkswirtschaft, Yenching-Universität.

Ch. §. 50.—Chou Chi-jen, Student der Medizin, Medizin-Hochschule.

Die Studenten berichteten dem Deutschland-Institut regelmäßig über ihre Studien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Bücherprämien: Durch die Peipinger Dienststelle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in China erhielt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im Laufe des Sommers 1958 eine Reihe von deutschen Büchern zur Verteilung an Studenten Peipinger Schulen und Hochschulen als Prämien für gute Leistungen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Die Bücher wurden an die Leiter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e Veranstaltungen: Um eine engere Verbindung und Fühlungnahme zwischen dem Deutschland-Institut und den noch in Peiping verbliebenen Universitätsprofessoren und anderen Gelehrten herzustellen, veranstaltete das Institut am 19. November 1938 ein Frühstück im Restaurant Fu Ch'üan Kuan. Über 50 Gäste waren der Einladung gefolgt, darunter die Rektoren und verschiedene Dekane der Fujen- und Yenching- Universität, der Direktor des Fan Memorial Instituts, die Mitglieder des Verwaltungsausschusses der Nationalbibliothek sowie eine große Anzahl von Professoren der Fujen-, Yenching- und Chinesisch-französischen Universität und die noch in Peiping weilenden Mitglieder des Institutes. Herr Prof. Yang Ping-chen, Mitglied des Übersetzungsausschusses, begrüßte im Namen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die Gäste mit einer kurzen Ansprache, in der er Charakter, Arbeit und Ziele des Institutes darstellte.

Um auch mit den Mittelschulen Peipings eine Zusammenarbeit anzubahnen, hatte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am 14. Dezember 1938 eine Reihe von Schulleitern zur Besichtigung seiner Räumlichkeiten und Einrichtungen eingeladen, an die sich ein gemeinsames Abendessen im Institut anschloß. In einer kurzen Ansprache legte Herr Wang Kin-ti, Mitglied des Übersetzungsausschusses und Leiter der Höheren Handelsschule, Aufgaben und Ziele des Institutes dar. In seiner Antwort dankte Herr Yang Ying-ch'ing, Direktor der 1. Städtischen Mittelschule im Namen der Gäste für die Einladung und betonte dabei Wert und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ür den Aufbau des chinesischen Unterrichtswesens.

Am Montag den 24. Juli veranstaltete das Institut in seinen Räumen einen Sinologennachmittag, zu dem außer Herrn Prof. Dr. Rousselle als Ehrengast eine Reihe von mit dem Institut befreundeten chinesischen und ausländischen Sinologen eingeladen war.

Besucherzahlen und Korrespondenz: Auskunftstelle und Bibliothek zählten während des Berichtsjahres 975 Besucher. (Ausschließlich besonderer Veranstaltungen)

Im gleichen Zeitraum gingen im Institut ein:

Briefe in deutscher Sprache	282
Briefe in englischer Sprache	27
Briefe in chinesischer Sprache	157
Postkarten	74

BIBLIOTHEKSAUSSCHUSS

Herr Ku Hua

Bibliothekar, National-Bibliothek,
Peiping

GESCHÄFTSFÜHRER

Die beiden ständigen Geschäftsführer des Institutes, Herr Dr. phil. Ernst Schierlitz und Herr Dr. phil. Feng Dsche waren im Berichtsjahr beurlaubt. Mit der Vertretung war Herr Dr. phil. Wolfgang Franke beauftragt.

Der chinesische Sekretär, Herr Chang T'ien-liu war für ein weiteres Jahr zum Studium in Deutschland beurlaubt. Bis zum Mai 1959 wurde er von Herrn Wang Hsi-yung vertreten. Als Lehrer der Abendschule war Herr Tung Sui-tseng tätig.

III. ARBEITSBERICHTE DER ABTEILUNGEN

1. ALLGEMEINE ABTEILUNG

Auskunft und Studienberatung: Infolge der allgemeinen Lage und insbesondere wegen der ständig fortschreitenden Entwertung des chinesischen Geldes wird die Zahl der Studenten und Gelehrten, die sich aus eigenen Mitteln zu einem Studienaufenthalt nach Deutschland begeben können, immer geringer. Diejenigen, welche trotzdem nach Deutschland zu fahren beabsichtigten, wurden über Studienverhältnisse, Lebenshaltung, usw. in Deutschland beraten, mit dem Deutschland-Institut in Verbindung stehenden Verbänden und Behörden empfohlen, und es wurden ihnen Zeugnisse ausgestellt bzw. übersetzt. Ferner wurde an Interessenten Auskunft erteilt über Fragen aus allen Gebiet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n Deutschland, insbesondere betr. Bildungs- und Unterrichtswesen. Nach der deutschen Seite hin stand die Abteilung in erster Linie mit der Deutschen Akademie in München in Verbindung.

Versand von Zeitschriften: Wie in vergangenen Jahren wurden von der Abteilung die vom Deutschen Akademischen Austauschdienst in Berlin herausgegebenen Zeitschriften „Geist der Zeit“ und „Kurzbericht“, und ferner eine Reihe von medizinischen und anderen Fachzeitschriften regelmäßig an chinesische Bezieher verschickt. Die medizinischen Zeitschriften wurden dem Institut freundlicherweise vom Verlag A. Thieme, Leipzig,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kommen ist, auch Sie den Weg leichter zu ihm finden werden. Mir ist des öfteren das Bedauern, welches die Aufgabe des deutschen Hauses in der Chin-Yü Hutung auslöste, zu Ohren gekommen und ich glaube, daß Ihnen dieses Haus einen Ersatz bietet. Ich hoffe, daß sie hier manche Mußestunde verbringen werden; denn es steht Ihnen neben einer Reihe von Zeitschriften die reichhaltige Bibliothek zur Verfügung. Mit Ihrem Interesse, das Sie dem Institut entgegenbringen, unterstützen Sie nicht nur die Schaffensfreudigkeit der Mitarbeiter, sondern helfen darüber hinaus mit an der Erreichung des gesetzten Zieles, nämlich einer engere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chinesischen Volk. Ich schließe daran den Wunsch, daß sich die Verhältnisse in unserem schwer geprüften Gastlande bald zum Besseren gestalten mögen und damit auch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reieren Entfaltung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zum Nutzen beider Völker geschaffen wird.“

Die Rede des Herrn Wobser wurde dann von Herrn Prof. Yang Ping-chen ins Chinesische übertragen.

Auf diesen offiziellen Teil der Veranstaltung folgten ein zwangloses Beisammensein und Besichtigung der neuen Räume. Die Gäste wurden dabei mit Tee, Kuchen und belegten Broten bewirtet.

II. MITGLIEDER

Als Mitglieder kamen im Laufe des Berichtsjahres neu hinzu:

KURATOREN

Herr General Hiang Tsé-ho Verein deutsch-studierter Chinesen,
Tientsin.

ALLGEMEINER AUSSCHUSS

Herr Dr. Fuchs Professor, Fujen-Universität, Peiping -
Herr Su Ping-ch'i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Kunming
Herr Tung Sui-tseng Dozent, Abendschule des Institutes
Herr Dr. Weiss Leiter der Deutschen Schule, Peiping
Herr Wu Feng-p'ei Dozent, Fujen-Universität, Peiping.

ÜBERSETZUNGS-AUSSCHUSS

Herr Chang Tung-sun Professor, Yenching-Universität, Pei-
ping
Herr Achilles Fang Sekretär der Monumenta Serica, Peiping
Herr Dr. Peter P. T. Sah Professor, Fujen-Universität, Peiping
Herr Wang Kin-ti Leiter der Höheren Handelsschule,
Peiping.

Herren, besonders hervorheben, daß das Institut trotz mancherlei Schwierigkeiten die die Zeitlage ihm entgegenbringt, nicht bloß nicht still geblieben, sondern sich immer erweitert hat und fortschreitet; denn das neue Haus — wie wir sehen — ist viel größer geworden, und mit dieser Vergrößerung und Erweiterung kommen alle Tätigkeiten des Institutes sicher auch mit zur Vergrößerung und Erweiterung. Dies haben wir natürlich vor allem zu verdanken Seiner Excellenz, dem deutschen Botschafter in China, Herrn Dr. Trautmann, dem Gesandtschaftsrat Herrn Dr. Bidder, dem gegenwärtig abwesenden Leiter des Institutes Herrn Dr. Schierlitz und vielen anderen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Herren, die direkt oder indirekt dem Institut geholfen haben. Mit innigem Dankgefühl erwähne ich als Vertreter der chinesischen Seite besonders heute hier alle diese Namen, nur bedaure ich, daß viele von meinen Landsleuten, die Mitglieder des Institutes sind, wegen der gegenwärtigen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nicht zu der heutigen Eröffnungsfeier erscheinen können. Denn auch wir chinesischerseits wissen ganz genau, welch eine glückliche, schöne und wirklich notwendige Tat die Begründung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in China ist, und wie freute ich mich und wie dankbar fühlte ich mich, als ich soeben den so interessanten Aufschluß des Gesandtschaftsrats, Herrn Dr. Bidder, über die Interessen vernahm, die die Deutschen, besonders ihre führenden Größen schon seit so langer Zeit und mit so großer Hochschätzung an China und der Forschung Chinas gehegt haben. Über so etwas können wir von chinesischer Seite zwar nicht berichten, aber ich kann sagen, daß unsere Sympathie mit den Deutschen und unsere Interessen an Deutschlands Kultur und Wissenschaften, die für den neuen Aufbau unseres Vaterlandes so wichtig und unentbehrlich sind, gar nicht geringer sind wie die von der deutschen Seite. Seiner Excellenz, des Herrn Dr. Trautmann's Wunsch, das ganze chinesische Land mit einem Netz solcher „Deutschland-Institute“ zu überziehen, ist auch ganz unser Wunsch, wir wünschen gar sehr, daß derselbe in Erfüllung geht. Und aus diesem Grunde wünschen wir also dem Deutschland-Institut in Peiping zu der heutigen Feier ferneres Gedeihen, Blühen und hoffen, daß dasselbe ganz wie bisher dazu beiträgt, die beiden Völker, Deutsche und Chinesen, auch auf allen anderen Gebieten, z. B. auf politischem, wirtschaftlichem, technischem, wissenschaftlichem, kommerziellen Gebiete einander immer näher zu bringen und immer fester zu binden.

Zum Schluß folgte die Ansprache des Leiters der Peiping Ortsgruppe der N. S. D. A. P. Herrn Wobser:

„Ich möchte noch kurz eine Frage streifen, die, wenn auch unausgesprochen, einige Beachtung verdient.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ist bisher vor der Öffentlichkeit nicht besonders in Erscheinung getreten. Das liegt einmal an der Art seiner Zielsetzung, die für den Auf- und Ausbau des Institutes zunächst einmal ein Wirken im Stillen erforderte und zum anderen naturgemäß für den Anfang nur einen beschränkten Kreis chinesischer Freunde und Gönner umfassen konnte. Des weiteren aber war die bisherige Lage des Institutes im Norden der Stadt — und ich denke hier besonders an unsere deutschen Volksgenossen in Peiping — für eine regere Benutzung, die es verdient, wenig günstig. Ich betrachte die Verlegung des Institutes in dieses schöne chinesische ruhige Haus als eine einladende Geste und hoffe, daß, nachdem das Institut Ihnen räumlich entgegenge-

Kiaotschou u. a. m. Jeder der Gesandten, die selbst in gegenwärtiger Zeit nach dem Kriege in China waren, nahm ein fast wissenschaftliches, weit über den Kreis beruflicher Pflicht hinausreichendes Interesse an diesem Land und seiner Kultur. Viele frühere Mitglieder des Dienstes sind wiederum in die Wissenschaft übergegangen, und wie eng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Staat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Sinologie ist, zeigt das Beispiel des Vaters des Sekretärs dieses Institutes, Dr. Franke, der als Konsul den Dienst verließ und die große Laufbahn auf wissenschaftlichem Gebiet bis zu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wiederum einer Gründung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 zurücklegte.

Unter diesen großen Auspizien einer großen staatlichen Tradition war es daher ein Schritt weiter, daß der jetzige Botschafter, Dr. O. P. Trautmann, dieses Institut gründete, nicht nur um rezeptiv die Forschung und das Wissen von China nach Deutschland zu bringen, sondern umgekehrt ein Instrument zu schaffen, das darüber hinaus auch China unsere besten Werte vermitteln helfen sollte. Noch auf der letzten Jahresversammlung sprach Herr Dr. Trautmann den Wunsch aus, das ganze Land mit einem Netz solcher „Deutschland-Institute zu überziehen. Wenn auch diese frohe Entwicklung durch die inzwischen eingetretenen Ereignisse gehemmt worden ist, so ist doch die weitere Ausgestaltung dieses Institutes zu der schönen Form, die Sie heute besichtigen, ein Zeichen dafür, daß die staatliche Tradition, die hinter diesem 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 steht, ewig ist und über Leben und Arbeitsdauer des Individuums hinaus ihre Ziele weiter verfolgt.

Ich freue mich, hiermit im Namen des abwesenden Botschafters, Herrn Dr. Trautmann, dieses Institut, das sich wie ein Phönix aus der Asche erhebt, in neuer Schönheit und zweckgemäßer Form, seiner Arbeit zu übergeben, und schließe mit dem Wunsch, der alle akademische Arbeit begleitet:

Felix faustumque sit!“

Die Reden des Herrn Dr. Franke und Herrn Dr. Bidder wurden von Herrn Tung Sui-tseng ins Chinesische übertragen.

Anschließend sprach Herr Prof. Yang Ping-chen als Vertreter der chinesischen Mitglieder und Freunde des Institutes:

„Herr Gesandtschaftsrat, meine Damen und Herren!

Wir alle sind stets der Meinung, daß es nichts Schöneres und Anzustrebenderes gibt, als daß Völker auf kulturellem Gebiete zur friedlichen Wetteiferung und Zusammenarbeit einander die Hand reichen und sich gegenseitig helfen. Dies war also, wie soeben Herr Dr. Franke schon hervorgehoben hat, Leitgedanke gewesen, als damals von chinesischer und deutscher Seite der Wunsch ausgesprochen wurde,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hier in Peiping zu begründen; und ich will nur noch zu den Worten des Herrn Dr. Franke hinzufügen, daß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diesem Ziele seit dem Anfang seines Bestehens bisher stets treu geblieben und es immer vor Augen gehabt hat. Heute bei der Feier zur Eröffnung des neuen Hauses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für das Publikum will ich aber vor Ihnen, meine

„Sehr verehrte Anwesende!

In Vertretung unseres Geschäftsführers, Herrn Dr. Schierlitz, heiße ich Sie heute herzlich willkommen. Ich danke Ihnen für ihr zahlreiches Erscheinen und nehme dies als einen Beweis für das Interesse, daß Sie dem Deutschland-Institut und seinen Bestrebungen entgegenbringen. Bevor ich jedoch den Vertreter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bitte, die neuen Räume feierlich zu eröffnen, möchte ich Ihnen mit ein paar Worten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ins Gedächtnis rufen.

Das Institut wurde ins Leben gerufen vor sieben Jahren, als Herr Cheng Shou-lin, ermutigt und unterstützt von Herrn Botschafter Dr. Trautmann und Herrn Botschaftsrat Fischer und einige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Freunden, in einem kleinen Raum in der Nationalbibliothek den ersten Grundstein legte. Leider mußte Herr Cheng nach kurzer Zeit Peiping verlassen. Es war dann Herr Dr. Hellmut Wilhelm, der die Arbeit des Herrn Cheng übernahm und zusammen mit Herrn Prof. Yang Ping-chen in mühevolem, selbstlosem Wirken das Institut bald zur Blüte brachte.

Herr Dr. Schierlitz, der heute leider nicht unter uns weilen kann, übernahm im Jahre 1935 die Geschäftsführung und baute das Institut auf einer erweiterten Grundlage zu dem aus, was es heute ist. Er wurde dabei auf das tatkräftigste unterstützt von Herrn Dr. Feng Dsche, der als Mensch und Dichter, als chinesischer Gelehrter wie zugleich als Kenner deutscher Kultur wesentlich zum Aufbau des Institutes beitrug. Als sich das Institut und seine Arbeiten immer mehr erweiterten, reichten die bisher gemieteten Räume nicht mehr aus. Unter vieler Mühe gelang es Herrn Dr. Schierlitz, dieses Anwesen für uns zu finden und mit praktischem Geschick und künstlerischem Verständnis einzurichten. Hoffen wir, daß es zu einem Mittelpunkt deutsch-chinesischen Geisteslebens sich auswachsen werde. Allen unsere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Freunden möchte ich auch bei dieser Gelegenheit für die Mitarbeit und Hilfe danken, die sie dem Institut zuteil werden ließen, und zugleich die Bitte aussprechen, daß sie uns auch in Zukunft ihre Freundschaft und Unterstützung erhalten mögen.“

Es folgte die Ansprache des Vertreters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Herrn Gesandtschaftsrat Dr. Bidder:

„Die deutsche Orientalistik, vor allem die deutsche Sinologie, beginnt— wie alles in unserem Vaterlande—in enger Verbundenheit mit dem Staat: Die Anfänge der chinesischen Abteilung der Staatsbibliothek in Berlin gehen, wie kaum bekannt sein dürfte, auf den Großen Kurfürsten zurück! Immer wieder, besonders im Laufe des 19. Jahrhunderts sind es die amtlichen Gesandtschaften des preußischen Staates, die durch ihre oft vorbildlich ausgestatteten Berichte das allgemeine, dann das wissenschaftliche Interesse am Orient im weitesten Sinne wecken und wachhalten, und so die Grundlage schaffen, auf der di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einsetzt. Ich erinnere nur an das weitreichende Echo, das das vielbändige Werk der Preußischen Gesandtschaft von 1861— die sogar von Künstlern von Rang begleitet wurde und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ihrer Mission gleichzeitig erfaßte— gefunden hat. Es folgen Gesandte wie Herr von Brandt, ein fruchtbarer Schriftsteller über Fragen des Orients— ferner die amtlichen Mitglieder der Waldersee-Expedition, des staatlichen Gouvernements in

lichen Präsidenten des China-Institutes in Frankfurt a. M., Herrn Prof. Dr. E. Rousselle gebeten hatte. In einer kurzen Ansprache hieß Herr Prof. Yang Ping-chen im Namen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den Vertreter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Herrn Dr. Northe und Herrn Prof. Rousselle herzlich willkommen.

INSTITUTSRÄUME

Wie bereits im vorigen Jahresbericht kurz angedeutet bezog das Institut im Sommer 1958 ein neues weit größeres Gebäude, da das alte, im Jahre 1955 bezogene Haus den Raumanforderungen nicht mehr genügte. Das neue Heim des Institutes liegt wie das alte ebenfalls in der Nordstadt, doch näher dem Zentrum. Es ist nicht weit von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ät, der Chinesisch-Französischen, der früheren Pekinger Reichsuniversität sowie der Nationalbibliothek und bequem zu erreichen. Das Anwesen besteht aus fünf Höfen mit neun Gebäuden, in denen folgende Räume untergebracht sind. 1. Nordhaus (Empfangszimmer, Abstellraum für Ausstellungsgegenstände, Raum für einen Teil der Bibliothek und einen Hilfsarbeiter) 2. Westhaus (Wohn- und Schlafzimmer des Assistenten, Badezimmer) 3. Osthaus (Bibliothek) 4. Durchgangshaus (Büro und Zeitschriftenzimmer, Abstellraum, Küche) 5. Äußeres Westhaus (Büro) 6. Äußeres Osthaus (Kleineres Unterrichtszimmer) 7. Südhaus (Großer Unterrichtsraum, Pförtnerzimmer, Dienerwohnung, Dienerküche) 8. Vorderes Gartenhaus (Wohn-, Schlaf- und Badezimmer für einen Gast) 9. Hinteres Gartenhaus (Abstellraum). Der vierte und fünfte Hof, in denen Haus 8 und 9 liegen, sind Gärten. Die oben genannten Räume leisten nicht nur allen Raumanforderungen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Genüge, sondern stellen auch nach außen hin ein würdiges und repräsentatives Heim dar.

Mitte Oktober waren die Reparaturen und Einrichtungsarbeiten soweit vollendet, daß die neuen Räumlichkeiten der Öffentlichkeit übergeben werden konnten. Zu der am 29. Oktober, nachm. 4 Uhr stattfindenden Eröffnungsfeier hatte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seine noch in Peiping weilenden Mitglieder und Freunde sowie die Deutsche Gemeinde eingeladen. Insgesamt waren trotz ungünstigen Wetters über fünfzig chinesische und deutsche Gäste erschienen. Zunächst begrüßte in Vertretung des abwesenden Leiters, Herrn Dr. Schierlitz, der Sekretär des Institutes, Herr Dr. Wolfgang Franke, die Anwesenden mit folgenden Worten:

I. ALLGEMEIN

Der vorliegende Jahresbericht umfaßt die Zeit vom 1. August 1938 bis zum 31. Juli 1939. Im Laufe dieses Arbeitsjahres fanden neben kleineren Besprechungen zwei größere Zusammenkünfte mit den noch in Peiping verbliebenen Mitgliedern in den Räumen des Institutes statt.

SITZUNG DES ÜBERSETZUNGS-AUSSCHUSSES AM 16. DEZEMBER 1938

Es wurden die in Vorbereitung und im Druck befindlichen Manuskripte der „Schriftenreihe“ und der „Sonderreihe“ besprochen. Ferner wurde beschlossen, die Schaffung von geeignetem Unterrichtsmaterial für den deutschen Sprachunterricht in Angriff zu nehmen. Als dritter Punkt stand die Herausgabe der schon seit längerer Zeit geplanten Zeitschrift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auf der Tagesordnung.

JAHRESVERSAMMLUNG AM 30. JUNI 1939

In der Sitzung gab der stellvertretende Geschäftsführer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Arbeit des Institutes während des letzten Jahres; es folgte eine allgemeine Diskussion, bei der in erster Linie über die Gestaltung der vom Institut neu herausgegebenen Zeitschrift gesprochen wurde. Anschließend begaben sich die Mitglieder ins Restaurant Hui Hsien Tang zu einem gemeinsamen Abendessen, zu dem das Institut auch die übrigen Mitarbeiter und Förderer der chinesischen Ausgabe von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sowie als Ehrengast den wissenschaft-

INHA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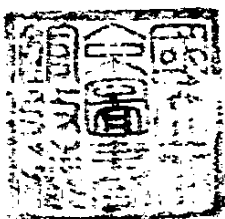
I. ALLGEMEIN	1-6
Institutsräume	2-6
II. MITGLIEDER	6-7
III. ARBEITSBERICHTE DER ABTEILUNGEN	7-16
1. Allgemeine Abteilung (Auskunft und Studienberatung, Versand von Zeitschriften, Öffentliche Veranstaltungen, Besucherzahlen und Korrespondenz, Stipendien, Bücherprämien, Abendschule, Besichtigung deutscher Firmen, Tee-Nachmittage für Studenten)	7-10
2. Übersetzungsabteilung (Schriftenreihe, Sonderreihe, Unterrichtsbücher, Zeitschrift)	10-13
3. Bibliotheksabteilung		
A. Bücherei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13-14
B. Öffentliche Veranstaltungen (Ausstellungen, Filmvorführungen, Vorträge)	14-16

DEUTSCHLAND -- INSTITUT

PEIPING

5. Jahresbericht

1938-1939



**Adresse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Peiping (Peking)
Ti An Men Nei
Huang-hua Men li
Hsi Niu-niu Fang 20
Telephon: 5850 Ost**

十月十一日
直接贈送

DEUTSCHLAND - INSTITUT

PEIPING

5. Jahresbericht

1938-1939